

文学需要在生命中感悟

——访著名作家张炜

本报记者 党云峰

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近日在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实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文学界盛会。作家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与时代同行,沉潜到生活深处,去体察、去担当、去书写。会议期间,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区别、文学评奖的作用、文学的困境和挑战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齐文化和鲁文化是有区别的

记者:从《芦青河告诉我》到《融入野地》再到《你在高原》,您创作历程中文学地理变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精神嬗变?

张炜:好多人讲山东喜欢讲齐鲁文化,其实齐文化跟鲁文化在好多方面都不一样,其中还包括一些对立的方面,比如鲁文化(儒家文化)是农耕文化,从农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齐文化是东夷文化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夷是繁体字的铁字去掉金字旁。东夷是中国炼铁的发源地之一,铁字就以夷作为标记。齐文化是海洋文化、商业文化,比较开放、浪漫。

我就是在海边长大的一个“齐国人”,小时候跟动物打交道很多,跟人打交道很少。童年的记忆是宝贵的财富,跟孤独寂寞融为一体,会使作品有不同的质



张炜近照

地。有人认为我刻意地那么多地写到自然、土地,其实这是由我的经历决定的。后来我到儒家文化气氛比较浓的济南生活。当时我不自觉地把齐鲁文化混为一团。虽然思想上受儒家文化影响很大,但是骨子里还是流淌着齐文化的血液,毕竟我是在东夷那块土地上长起来的。

我在作品中描写的芦青河看起来是地理意义上的一条河流,但更是精神上的、文化意义上的河流,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齐文化的一条河流。我在作品中用芦青河代替了泳沫河这个真名。后来写来写去写得多了,芦青河就成为代表北方的一条河流。顺着芦青河走遍古齐国的大地,我感触很多,郁积了很多想法,于是我就计划写一个长卷,当

标,又担负着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的使命;它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改革创新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目前,文化领域不少方面受传统体制影响还很深,加快文化发展还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破解影响和制约文化发展的难题,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围绕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新进展。目前,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确定的目标,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加大力度、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力求取得新突破。

文化要创新,创新则要惠及于民,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创新的丰硕成果。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该依靠人民,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背景下,加强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日益成为新形势下

的必然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之一。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注意防止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简单化对待文化艺术。

总之,文化要惠民,就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文化不创新,就没有繁荣和发展;文化不能惠民,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时的名字还没有确定为《你在高原》,但是结构和规模已经是《你在高原》了,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后,我开始行走。

作为作家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带着创作的计划和任务,在行走中收集资料固然很重要,但它会遮蔽一些东西,发现不了自然、山川、土地、天籁和人更深层次的东西,因为目的性太强,功利性使它区别于童年的行走。童年的行走不是为了创作,而是出于个人性情和生命的需要,自然流淌的游走对生命特别重要,这种生命表达更自然更质朴,对文学更有意义。因此,有些人说童年对他影响大,一谈到童年就有磨灭不了的印象,作品的表达受童年经历制约特别多。我意识到这点之后,就尽可能注意倾听天籁,到自然、山川中记录。大概走了一二十年,我获得了写作《你在高原》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专门为了获得而获得,但获得的却更丰富。如今我会不自觉地在行走中捎带一点童年行走的朴素性。

文学评奖不能庸俗化为摸彩活动

记者:您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期待回答的声音》,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在期待什么?又做出了怎样的回答?

张炜:我觉得我整个不停止的诉说,在字面上的诉说(包括演讲)应该有个回音,这个回音不很具体,文学的回音很模糊,它不切近,它很遥远,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写作的时候,是跟另一个人在高处、在远处的“我”的对话,这个回答是期待时间的回答,期待一个很遥远的回答。

我在东部山区里废弃的大房子里住的时候读了大量的书,包括《楚辞》。我在这种自然背景下理解屈原就有了别样的心情,更能体会到屈原的忧愤,我把这些感悟记下来,就成了《楚辞笔记》这本书。《楚辞笔记》是我在写《你在高原》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楚辞》的回响、当年屈原的吟唱也期待着回答的声音,我想每一个诗人、每一个作家都隐隐地期待一个回答的声音,我的很多作品也试图在回答过去,表达我对过去的怀念、敬仰,我似乎听到历史长长的叹息声,我的作品也是无数回答当中的一点声音吧。

记者:您怎样看待经典和获奖?张炜:经典跟当代扯不到一起,经典必须经过漫长时间的检验,成为典籍。一般来说检验一

部书是不是经典,100年稍微沾一点点边。我写的《古船》、《九月寓言》这些书都接近30年了,还在印出,即便这样我也不乐观、不自信,因为需要更长的时间,作者应该对时间有足够的敬畏。

书在找读者,读者也在找书,就因为对阅读的不同选择,区别了人的素质、生命的质地。我有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书有很多读者,另一方面又觉得我有多少理由让读者拿着我的书一页一页地翻呢?

评奖只是一部分评奖的人对作家的理解,鼓励和肯定,绝不能当成文学的标准。评奖只与参加评奖的人有关,表明评委个人的立场和尺度。世界上最权威的几个奖仍然不是文学的标准,所以好多了不起的大作家都没怎么得过重要的文学奖。评奖只是在文学创作活动当中,人们制造的一个个“节日”。节日的目的是鼓励,是欢庆,甚至带点娱乐性质,这对文学的发展是好的,但也有负面作用,就是它过于通俗地介入了文学判断,会让普通民众误解为评奖是标准。文学评奖切不可搞成体育比赛,更不能庸俗化为摸彩活动。文学具有深沉和晦涩的诗学属性,不是简单地靠制造几个文学的“节令”(文学奖)所能够诠释的,它需要在生命中感悟。

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是业余的

记者:怎样解读您在作品中对土地的歌颂和对城市的批判?您是如何面对生活苦难和创作困境的?

张炜:有人说我是一个写了大量农村生活的写作者,实际上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我写知识分子比写农民多,写城市生活比写农村多,大概我三分之二的笔墨都花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上,我即便写乡村写大地,也是在写知识分子在大地上的表达和感悟。

一个从小在林子里成长起来的人,在水泥丛林里肯定感觉不适,但这种不适应也不是一味地排斥,我的作品中不只是对大地的歌颂。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童年的那片林子,我会一生像对待母亲一样感激它、怀念它、保护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字眼。大地、山川在我心中的地位,使我不可能不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拿它简单地跟城市生活对立。我们在城市里寄身,依靠城市,城市有它的好和不好。我的焦虑、不安、厌恶,任何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会有同感。

我酷爱写作,别的事情没试过能不能做好。我用大量时间阅读和思考,一方面看起来比专业作家似乎更“专业”,另一方面我又很排斥专业作家的生活格局,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都应该是业余的,作家要积极地生活、关心社会,到山川大地里边去,有了感悟才能把它落在纸面上。这个“工作”是一种创造,是源于生命灵魂的激越状态。如果像专业作家一样按时“工作”,效果反而不好。早晨8点开始激动了,下午5点停止激动,这是不正常的。专业作家是违背文学创作的本质意义的,所以我有时候很矛盾。

如今文学的困境和挑战很多,举一个例子,现在发表作品比以前容易多了,但越是这样越危险,文字“沙尘暴”向你逼来,天昏地暗不辨东南西北,在文字信息的“沙尘暴”里,一个人要站稳脚跟需要很大的定力,这就需要回头看经典,更好地继承传统。在传统经典中提炼淬火重新站稳脚跟,而不是背离传统和经典,否则没有根,肯定会被沙尘暴卷走。关键问题是怎样亲近经典和传统,全新地来一番改造、接受和使用。

记者:您怎样看待“80后”“90后”的作品?下一步有何创作打算?

张炜:“80后”“90后”的作品,我读的不是太多,感觉他们很有生气。文学是一代接一代的事业,我们没有理由对整整一代或两代人抱希望,或许其中许多优秀者的声音不被我们注意,这需要时间去鉴别。

生活中充满苦难,这种忧虑和牵挂肯定会反映在作品中,但我大部分时间在积极地、认真地生活。善意地回应生活,善意地表达生活,让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作品应该温暖人。下一步的创作,得看我个人的身体情况和我个人的兴奋点在哪里,写作很多时候不能预想。

相关链接

张炜 1956年11月出生
于山东省龙口市,现任山东省作协主席。著有《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远河远山》和《你在高原》等18部长篇小说,并被译为多种文字。曾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

时 评

学术研究不能误用“学以致用”

秦 毅

有时候,一条新闻给人的概念是清晰的,但把同样清晰的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就颇有戏剧色彩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有媒体报道,中国国际论文发表数全球第二。同时又有媒体撰文指出,国内研究生论文没有学术底线。是喜,是悲?对于论文现状,难免情感困惑,干脆套用“成绩很明显,问题也不少”这句话朦胧一把,当个骑墙派。

提到数量,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质量,并且在“量质质变”的潜意识中,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观点带入论文评价领域,认为质量不高与数量庞大之间关联度极高。然而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认真治学、态度严谨的学人,其每一篇论文都有相当高的质量,而一些急于应付的毕业生、职称参评者,自己唯一的一篇论文也可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遑论学术价值?因此,“量多害质”的观点难以成立。至于有学者炮轰国内研究生论文没有学术底线,实质上炮轰的是“学以致

用”的功利化论文出产方式。将学到的东西用于实际之中,强调实践性,这样的学以致用无疑是应当提倡的。但一些人所追求的“用”只与论文发表有关,刊发是终极目标,便是大功告成,于理论的发展、实际运用却毫不上心。这种“学以致用”弥漫的是浮躁、急功近利的为学态度,学术底线被践踏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用心于刊发外,有些研究者的“用”往往还带有很强的结果性特点,似乎研究工作一旦在春天耕耘,秋天必须要有所收获。我们知道进行学术研究是一项极其艰苦而有时又是极其困难的思维过程,它要求研究者能真正坐下来,仔仔细细地探索、冷冷静静地凝思和反反复复地推敲,甚至需要推倒重来之的勇气和气魄。“学”与“用”之间不可能有时间的限定、空间的挤压,快速论文只会诱使学人提前采摘青色的果实,甚至产生出“有投入必有产出”的研究心态。这

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研究方式,把“学”与“用”机械、功利地联系在一起。当论文成为对其“苦劳”而非“功劳”的展示时,“学以致用”不但成为劣质论文的作坊,更成为学术态度、学术担当精神的屠戮。

与此同时,“学以致用”极易导致为“用”而学,正如一些教授所痛心疾首的那样,一些研究生既达不到深读,也做不到深谈。为了论文而论文,只知道上网查资料,只做“有用”的事,看“有用”的书,将专业系统的基础训练都视为“无用”之功。

因此,对于已成为或将要成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广大研究者来说,在踏踏实实治学过程中少点“学以致用”,多一点学术担当精神,成为一个坚定的精神守望者,亟须做好自己的选择,增强学术自持力。而学者的选择,对于现代喧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来说,引领和标杆意义不可忽视,何去何从自然应更加审慎。

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向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之一,也是我所敬重的同辈学者之一。他的《西方美学论稿》即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向峰先生说:“写出《西方美学论稿》,出一本独立存在又有相当规模的书,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梦想。”现在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西方美学研究主要隶属于西方美学史学科。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写的两卷本《西方美学史》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研究西方美学的著作。改革开放后,我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需要,也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教程》。此后又陆续涌现了好多本《西方美学史》,更有蒋孔阳先生和汝信先生分别主编的多卷本《西方美学史》。在新时期,西方美学研究已有很大进步。但是,西方美学史是一门艰深的学科,长期以来人们在编写西方美学史的时候,更多偏重于引进和介绍,对西方美学家和美学流派的观点辨析讨论不够,往往显得很不好懂,理论脱离实际,缺乏现实感和理论深度。不论读者还是作者,对西方美学史的写法都不很满意,对此美学界多次开展过讨论。我觉得,向峰先生的《西方美学论稿》开始打破了这种局面,这是一部后来居上的很有特色的著作,是西方美学研究可喜的最新成果。

《西方美学论稿》是向峰先生多年科研和教学的心血结晶。全书五大编三十五章,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重点突出西方美学史上主要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是按时代先后的顺序展开的。该书是一部重点突出而非面面俱到的西方美学史,更适合教学,突出的特色是较好地做到了史与论的结合,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流水账式的表述。向峰先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当今的高度,对历史上的各种美学观点、美学思潮,做了深入的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分析和评论。他没有停留于史料的客观介绍,而是以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着力于弄清和阐释历史上的各种美学理论、观点、范畴是怎样形成的,其真实内涵和实质是怎样的,哪些是今天可以吸收的有益的正确的,哪些是有局限或是错误的,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有关是非的评论。他引用了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用文字创作和欣赏的审美实践,来说明、对照、印证或批评历史上的美学观点,把美学理论和审美实际结合起来。例如,仅在亚里士多德美学的思想这一章中,他就结合讲到了宋代词人张先的《一丛花》、《水浒传》和欧阳予倩的话剧《武松和潘金莲》、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

雨》等作品。在其他章节里,你还可以看到有关《红楼梦》、《聊斋》、曹禺的戏剧、贺敬之的诗歌等的议论。在理论阐发的过程中,他还广泛融入了易经、孔子、庄子、释迦牟尼、马克思和恩格斯、毛泽东、鲁迅等的相关美学思想,采用把中西美学、古今美学加以对比的方法,使美学史的写作变得立体化。这种把史与论、美学与艺术、中与西、古与今相结合的写作方法,比通常的写法显得更生动,更开阔,更好懂,更有学理性、启发性和现实性。我觉得这种写法是很好的,这本书不但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系统的关于西方美学史的知识,而且能够激发读者美学理论上的思考,使之获得多方面的启发,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是会有帮助的。当然,“文无定法”,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写作方法,也不认为这本书已写得十全十美,但是我敢说,与一些呆板枯燥的《西方美学史》相比,在写法上它已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范例。

其实,写出一本好的著作,不只是写作方法的问题,而首先是思想理论水平的问题。朱光潜先生晚年谈他美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时多次指出,要学好美学首先要弄通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掌握哲学、历史、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向峰先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他是一位博学多才、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学生。他长期在高校辛勤耕耘,治学严谨,硕果累累,已出版过30多部著作,发表过数百篇论文,并多次获奖。在这本《西方美学论稿》之前,他已出版过《中国美学论稿》、《中国现代美学论稿》和“手稿”的美学解读”等美学专著。其中《“手稿”的美学解读》是我国学术界唯一一部全面系统解读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美学思想的专著,是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和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他的《西方美学论稿》写得这么好,这么有特色,绝不是偶然的,是和他的主观条件和努力分不开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性的任务。要把我国建设成文化强国,我们不但要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也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几千年的西方美学史是一座丰厚的文化宝库,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懈努力。我们期待在神州大地上涌现出更多复合型人才和更多的优秀著作。

观点摘编

作家最难写的是当代性

从《玉米》、《哺乳期的女人》到《推拿》,作家毕飞宇终于“进城”了,这种有关城市的写作是否赶时髦?毕飞宇说,要表现当代的中国必须写城市。“真正让中国作家觉得下笔困难的,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当代性。”但这种当代性却同时意味着这个过程必须是动态的。

在文化认同上下工夫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要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文化软实力的,也是不会被人尊敬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建设文化强国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内搞文化专制,对外搞文化强势。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世界上推动文化建设,必须尊重“多元”

“如果我写农村的话,我可以把时间向前推,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晚到80年代。但是城市化的历史才不过短短20年。一个作家生活在当今是幸运的,因为有这么多题材可写。静态的东西容易把握,表现动态却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毕飞宇说。

(吴敏,摘自12月6日《南方日报》)

的特点和现实,把工夫下在文化认同上。这就是,在国内文化建设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并在这样的自觉认同上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在这样的认同基础上增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和传播能力。

(李君如,摘自12月5日《学习时报》)